

釋“野草”二則

畢 奐 午

釋“題 辭”

“題辭”是“野草”這一本詩集的序言。但“題辭”的本身也就是一首强有力的詩篇。

在“題辭”中魯迅先生以象征性的語言談到產生“野草”的時代背景及“野草”的社會作用。對翻天覆地的新的革命高潮之到來，魯迅先生在“題辭”中表示了無限喜悅及迫切盼望的心情；而對腐朽的黑暗統治則是不惜與之偕亡，向之作決死的鬥爭。

這篇“題辭”是在1927年4月26日寫的。最初發表於1927年7月2日出版的第138期“語絲”上（新版“魯迅全集”注）。“野草”出版後，初版，二版，都有這篇“題辭”。到“野草”在上海印行第四版時，“題辭”卻不見了（孫机：“對雪草‘野草的題辭’的意見”。載“文藝報”1952年第一期）。這原因可參看“魯迅書簡”中致夏傳經的信。信上說：“……‘豎琴’的前記是被官辦的檢查處刪去的，去年上海有這麼一個機關，專司秘密壓迫言論。出版之書，無不遭其暗中殘殺……‘野草’序文，想亦如此……。”這信是1936年2月19日寫的。魯迅先生逝世後出版的“魯迅全集”（舊版）這“題辭”也未見。直至“魯迅三十年集”出版才又重新收入。“題辭”發表之後，遭到國民黨反动派的摧殘，殺害，即是這“題辭”強烈的戰鬥力的證明。因為它所呼喚的革命的火與力，使國民黨反动派為之戰慄。

“題辭”的全篇分為六段。

“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這是第一段。在這裡魯迅先生寫出他在寫“題辭”時矛盾，複雜的心情。“題辭”是在廣州寫的。當時正是廣州“四·一二”事件發生之後，國民黨叛變革命，對革命羣眾及進步青年施行殘酷的屠殺政策的時期。魯迅先生當時也處在反革命勢力的迫害與監視之下，隨時有生命的危險及縲絏之憂。心情是憤怒的，沉痛的，但對於翻天覆地的新的革命高潮之即將到來則表示迫切的希望與無限的歡欣。然而這種心情，在當時只是充溢胸臆，而不能直白地形諸語言文字。因為當時背叛了革命的國民黨，其殘虐有甚於過去的軍閥。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先生寫“紀念劉和珍君”一文時就沉痛的寫道：“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視聽，那裡還能有什么言語。”又寫道：“嗚呼！我說不出話。”（華蓋集續編）寫“野草”的“題辭”時說“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那心情是與在寫“紀念劉和珍君”一文時是一樣的。“三閒集”中“怎么写”一文中有與此相同的句子：“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遷，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裡。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裡，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

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從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是海天微茫，黑紫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欄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无量的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有人曾引這一段話認為是野草“題辭”中頭兩句話的唯一的解釋。這是不恰當的。倘若孤立的看這兩句話，即單純的作為作家在進行寫作時一種思想狀態的描寫來解釋，還可以勉強這樣講。但如結合具體的文章寫作時的具體環境，那就不那麼簡單了。魯迅先生在“四·一二”之後的廣州正象魯迅先生在“華蓋集續編”中“死地”一文中所指出的軍閥統治下的北京的情況，殺人者以“殺人為唯一要道，甚至於當作快樂，”而評論界則除了反動統治階級的走狗文人外，一切正義的呼聲，都被扼殺。這裡是同那時魯迅先生所說的“我實在無話可說”，“我說不出話”（紀念劉和珍君）的情況是一樣的。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這是第二段。這裡是寫“野草”的產生。在這一段中講，對於過去生命的死亡有大歡喜，對於死亡的生命的朽腐有大歡喜，這原因就是因為証實了過去的生命曾經是存活的，並不是空虛的。因此就無悔恨而有歡喜。如結了累累秋實的果樹，對花與葉的凋落是無所謂感到悲哀的，所可哀的則是那些虛耗歲月，不為人民作事的人。魯迅先生最恨虛偽的做戲式的生活着的人。如“華蓋集續編”中“馬上支日記”里所痛斥的“做戲的虛無黨”就是這種人。在這種人的生命中決無如魯迅先生所說的生命的“死亡”與“腐朽”的階段，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存活”過，一切言行都是卑劣的，虛偽的，空虛無物的，或者根本就是衰朽腐爛的。在魯迅先生自己，所謂生命的“存活”與“還非空虛”，它的内容就是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及其御用文人的鬥爭。“野草”中的詩篇也就是這鬥爭中的產物。“野草”計散文詩二十三篇。它的寫作時期是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這一段時期，正是魯迅先生以孤胆英雄的戰鬥精神向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以及依附於他們的所謂“文人學者”進行着最激烈的鬥爭時期。而且這一段時期里，魯迅先生所写的作品是非常之多的。“墳”的大部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的全部，“彷徨”“朝花夕拾”的全部，“故事新編”的一部分……等等。而“野草”只是這一段時期中全部作品的很小的一部分。“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是魯迅先生謙抑之辭。其實在這段時期里魯迅先生並不是只写了“野草”，而且這“野草”中一些篇章的戰鬥力量也不下於其他作品。魯迅先生在“自選集自序”中也是謙遜地講着“野草”的產生的，他說：“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我將大笑，我將歡唱。”這是第三段。這裡以極簡練深刻的語言描述野草的生長，野草如旧社會反動統治階級壓榨下的人民一樣，無衣，無食，無權。然而野草却各據一抔壤土，頑強的要生存下去。自然它的生存是艱難的。它既吸取清新的露和水的滋潤，也經受陳死人的血和肉的浸蝕。這裡，清新的露和水，是指當代的進步影響，無論是理論的闡述，革命者的行動，社會的巨變（如十月革命）等都是。如在“熱風”“隨感錄”的“聖武”一文中，魯迅先生就讚頌十月革命是“新世紀的曙光”。陳死人的血和肉，就是陳旧的傳統，束縛新思想的东西。魯迅先生不是常說自己是“背着因襲

的重担”的么？但鲁迅先生是“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按：“我们现在怎样作父亲”）不顾一切的向敌人进行战斗的。因而，野草的成长就必定遭受敌人的狠毒的践踏和删刈。但野草仍然长叶开花，顽强的夺取它的生存。野草夺取它的生存，也同时就是打击敌人的残暴。这对人民是有好处的。鲁迅先生在“一觉”中写道：“野薊經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我记得托尔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动，因此写出一篇小说来。”又说：

“但是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拚命伸长它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見就怡然觉得迁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欢唱。”这两句诗迸射着对于敌人，对于死亡的鄙视与蔑视的光辉。鲁迅先生在“热风”“生命的路”中说得好：“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我自爱我的野草……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我将大笑，我将欢唱。”这是第四段。这一段与前一段是全篇的中心，两段文字揭露了心灵上的极大矛盾，前一段是生与死的矛盾，后一段是爱与憎的矛盾。在生与死之矛盾中则是努力夺取生存，但又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爱与憎的矛盾中，是为了消灭可憎的事物，而不惜牺牲最可爱的生命。艺术作品总是环境的产物，而产生野草的地点与时间则正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可诅咒的地方”与“可诅咒的时代”。“野草”是写于1924——1926年的北京，“题辞”是写于“四·一二”事件后的广州。当时这两个地方是极端残暴与黑暗的。所以鲁迅先生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而对此则是进行坚决的斗争。如“华盖集”中“忽然想到之五”所说的“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四·一二”事件发生，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又笼罩人间，但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却更深入地发展，这就是“地火在地下运行”的本意。熔岩喷出烧尽野草、乔木、……，是希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能把污浊的旧社会给以清洗。但这对于作家来说，面临革命的火正是一种严格的考验与锻炼。“华盖集续编”中“马上支日记之二”里面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着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者生活着，开拓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了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生出更新的文艺来。”又说：“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里与前一段虽是重叠的歌唱。但歌唱的内容则不相同，鲁迅先生看见“地火在地下运行”并希望有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袭来，而自己也准备向这大波冲进，即献身于革命事业。他对过去是不作任何留恋的。让喷出地般的熔岩，焚烧可诅咒的地面，把这地面上的一切旧东西统统烧尽，甚至连自己的野草在内，并且即使自己受伤，但也为开拓新的生活为新的革命到来而欢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前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这是第五段。

“天地有如此靜穆”一語，寫的是黎明前的黑暗，暴风雨前的沉寂，以及对革命大波的到来的迫切希望的心情。因为地火虽在地下运行，但尚未爆破地殼噴出。凝固的地殼就是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势力。它造成可怕的“靜穆”亦即凄惨瘡痍的氛圍。在“小約翰”的“小引”中写着1927年“四·一二”事件以后，魯迅先生在广州时的心情：“……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小港是十幾支獠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的悲歡。也彷彿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却漸漸知道這雖然在沉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只是不見火云，時霽陰雨，若明若昧……。”從這裡就可看出那“靜穆”是怎麼一回事來。而且不見“火云”不見山崩地塌般的革命大波的到來，所以作者還不能大笑而且歌唱，有的只是“這一叢野草”。其實，在“這一叢野草”里就飄動着火云和呼喚革命的歌唱，以及使反动派戰慄的笑聲的。

“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即是希望山崩地塌般的革命火速到來。同時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也即證明它的生存，戰鬥的力量與敵人之潰敗，毀滅。“熱風”的“題記”中說得好：“我以為對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疮癰一般，倘非自己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去吧，野草，連着我的題辭！”這是題辭的最末一段，是“題詞”的結語，但也是魯迅先生更向前進的信號。魯迅先生在上文中說過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接着又說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這中間可看出作者心情之巨大矛盾。但在當時整個的中國正沸騰在大矛盾，大分裂中。魯迅先生的苦痛是與整個時代相關聯着的。對此，胡繩同志曾作過很好的分析。他說這心情“不是引導向退嬰萎縮的失敗主義者的心情，恰恰相反，倒是向前跨進更大一步的新生的因素，雖然里面包含着悲觀絕望的成分。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能夠通過大悲觀而走向真實的大希望，通過絕望而開始去學習別種方法的戰鬥。”（見“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魯迅先生在“野草英文譯本序”（二心集）中也談到這一點：他寫道：“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1924——1926年北京所作……後來，我不再作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已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至於這樣的感想存在，我想，這也許倒是好的吧。”

以上是關於“野草”“題辭”的段落，語句的解釋。通過這些解釋我想可以有助於我們去了解“題辭”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的全貌。我們知道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時期，是魯迅先生由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立場轉向無產階級立場的時期，這巨大的徹底的改變使他从過去苦痛的時時感到絕望的抗戰中，找到了新的真實的希望。這情況魯迅先生在二心集序言中曾有所追敘：“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恨這個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

但魯迅先生的轉變更有一特點是必須注意的。那就是過去“……中國許多小資產階級分子之進入革命，往往是更多帶着主觀的空洞的革命熱情，却較少有從實際出發的沉着的思想能力，如同瞿秋白同志所批評的‘他們沒有前一輩的黎明時期的現實主義——也可說是老實的農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魯迅恰恰是所謂‘前一輩’的知識分子中的最傑出的代表。他的大半生都消耗在和舊社會的頑強搏鬥中，由此他換來了無數的創傷和苦痛，也取得了豐富的感

覺和經驗。他撫摸着滿身創傷，針對着他所生活過來戰鬥過來的中國現實，經過了認真而沉重的思索，他才體認了新的真理。當他一旦把握新的真理的時候，就……忠誠不二，生死如一地為保衛它而作戰了。”（胡繩：“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

這“題辭”也就是魯迅先生拋棄苦痛與絕望，滿懷信心更向前進軍的誓辭。

釋“過客”

“過客”的主題思想，我們應當通過過客這個人的行動和言論去了解。“……從這個人（過客）的精神狀態看，無疑，這是當時魯迅先生對像他一樣的战斗者的寫照；他為了尋找人生和社會真理，披荊斬棘，在夜色茫茫之中勇猛前進。”（“萌芽”1956年10月號：“‘過客’的介紹辭”）

“過客”中的人物，老翁，女孩，過客都是作者從當時的現實社會中提煉出來的代表著一定社會本質的形象。老翁是代表著當時社會上一些飽經世故，自以為看透了一切，精神疲敗，思想極端保守的人；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講的“退隱”的人。（“自選集自序”中說：“後來新青年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女孩，代表新生的少年兒童一代。天真，純潔，喜愛美好的事物。過客的形象是與舊社會雖已決裂，但尚未與革命羣眾相結合，孤獨的，奮然前進的知識分子的寫照。

“過客”的內容在“野草”中同其他詩篇比較起來，講解的人是多的，讀者也比較是普遍的。現在我只就詩篇中人們所沒有注解過的，或雖有注解而意義並未十分明確的字句作一些補充的解釋。

“客……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只一個人，我不知道我本來叫什麼。我一路走，有時人們也隨便稱呼我，各式各樣地，我也記不清楚了，況且相同的稱呼也沒有聽到過第二回。”在這段談話中“我只是一個人”表明魯迅先生在寫“過客”時，孤獨之感是深重的。當時魯迅先生孤獨感的來源是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於前期思想的局限性使他感到未來幸福社會的遙遠；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無論在思想方面或行動方面都超越了他同時代的一般知識分子，而成為一時感覺是處於孤立地位的戰士的原故。胡繩同志在“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一文中寫道：“與唯心論觀點相對立著的，從實踐鬥爭中培養起來的現實主義的戰鬥精神起着偉大的抗毒素作用。魯迅儘管是以小資產階級的進化論與個性論思想出發，但他從不用一套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構成一個小天地，使自己安身立命於其間。恰恰相反，他永遠是在突破這個思想圈套去和現實社會鬥爭相接觸。魯迅的個性論是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這和從個人出發的利己主義有着原則上的區別。”魯迅先生在1926年底也曾如此說過：“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於弄筆墨的，却還未遇着真有几分為社會的，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兩地書”：第85信）

“我不知道我本來叫什麼，有時人們也隨便稱呼我，各式各樣地，我也記不清楚了，況且相同的稱呼也沒有聽到過第二回。”如果我們說過客就是當時如魯迅先生一樣的戰士的寫照，那麼魯迅先生就會被當時的“文人”“學者”們加以各樣的名號。在“華蓋集續編的續編”中有着記錄：“其實‘大團圓’（關於阿Q的）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无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

園’？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於是‘學者’或‘教授’？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藉夫’乎？乎？乎？乎？”（“阿Q正傳的成因”）在同書中“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一文中也有記錄：“‘新女性’八月號登有狂飈廣告說：‘狂飈運動的开始遠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数进步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茲为大規模地进行我們的工作起見于北京出版之‘烏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飈叢書，及一篇幅較大之刊物’云云。我在北京編輯‘莽原’，‘烏合叢書’，‘未名叢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飈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为什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則假借虛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业經先有陈源在‘現代評論’上，近有长虹在‘狂飈’上，叠加嘲罵，而狂飈社一面又錫以第三頂‘紙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驅者’即英文 Forerunner 之譯名。此等名号乃他人暗中所加，別有作用，本人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嘗高兴，倘見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

“客……从我还能記得的时候起，我就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前面！”这一段談話的意义可参考克里布索娃写的“魯迅和他的野草”一文。这位勇猛的过客，他一时虽觉得他“只是一个人，而且也沒有确切的目的地，但他知道不應該停止前进，必須永远的走。”（“文艺報”1956年第20号附冊）

“翁——前面？前面，是墳”这里是說对于象“过客”中的老翁那样的人，他所看到的，在人生旅途的前面，只是墳墓。

“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許多許多的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們的。”这里說女孩所見与老翁不同。坟墓不是她所注意的，她只看見那里有許多野百合，野薔薇。

“翁——我单知道南边，北边；东边，你的来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許倒是于你們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咀，据我看来，你已經这么勞頓了，还不如回轉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沒有一处沒有名目，沒有一处沒有地主，沒有一处沒有驅逐和牢籠，沒有一处沒有皮面的笑容，沒有一处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同轉去！”“翁——那边不然。你也許会迂見心底的眼淚，为你的悲哀。”这一段對話是表明这位老年人可能也曾奮斗过，但后来他却成为对旧社会妥协和退隱的人了。所以他此时是不但不能为过客指明道路，而且还劝他从原路回轉。但过客是不同轉的，他是旧社会的“叛臣逆子”他虽然前进的目标尚未十分明确，但他是絕對不同旧社会妥协。至于老翁所說：“那也不然，你会見心底的眼淚，为你的悲哀。”这也就是劝过客如同轉去，可能迂見同調的人，即在艰苦的行程上，停止前进，走回头路的人。彼此一定能互洒同情之淚，为各自的悲哀。但这是过客所决不能接受的。

“客——……我只得走。况且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这段談

話。我們可以引用巴甫連柯的小說：“路上的呼聲”中幾段話來幫助我們更深入的理解那種號召前進的呼喚所具有的力量。巴甫連柯寫道：“我想起了柯羅連科所寫的一篇遠處的幾點星火怎樣鼓勵了一個夜行人的狹窄的小說。後來又想起伊凡·蒲寧的‘山路’。這篇小說中的一段總使我非常感動，我甚至可以背得出來：‘我的一生中象這樣艱難和荒涼的山路，已經經過了多少啊！忧愁，苦難，疾病，受人的吵鬧，朋友的出賣，象黑夜一般進逼我——而離開一切我所親受的時候就要到來了。我硬起心腸，又把我那流浪者的手杖拿在手中。新的幸福要爬很高才能達到；而且爬起來非常吃力，黑夜，迷霧和風暴在高處等着我，可怕的孤獨又在山路上抓住了我。……但是前進！前進！’巴甫連柯又寫道：“真是美好的一夜，我心里想，當我回憶起姑娘那柔細的，由於害怕而有些發抖的聲音里藏着何等的力量時，我不禁微笑了。而在我這個城里人的斷斷而輕弱的聲音里——我總以為它萎靡而感到羞恥，原來也藏着足以鼓勵別人的意志的力量。主要的——是前進，並且招呼人們跟着前進，即使聲音很輕，即使它由於疲乏和緊張過度而發抖吧，但前進，堅決的前進，並且招呼人們跟着前進…………你也就能得到回答。”

“爹——是的。他似乎曾經也叫過我。……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這裡是寫老爹既不能勸過客回轉，就另作建議勸過客休息下來，而且不必去理會那呼喚過客前進的聲音。

“客——唉唉，不理他……。（沉思，忽然嗅驚，傾听着）不行！我还是走的好，我息不下，可恨我的脚早經走破了。（準備走路）”“孩——給你！（遞給一片布，）裹上你的傷去。”“客——多謝（接取）姑娘。這真是。……這真是極少有的好意。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斷磚坐下，要將布纏在踝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還了你吧，還是裹不下。況且這太多的好意，我無法感激。”“翁——你不要這麼感激。這于你沒有什麼好處。”“客——是的，這于我沒有好處。但在我，這布纔是最上的東西了。你看，我全身上可有這樣的。”“爹——你不要當真就是。”“客——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會這樣：倘使我得到了誰的布施，我就要象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但是我還沒有這力量，即使有這力量，我也不願意她有這樣的境況，因為她們大概總不願意有這樣的境況。我想這最穩當。（向女孩）姑娘你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點了，還了你吧。”關於這一段對話，在“過客”中是比較難解的。過去有些解釋：如陳山同志解釋是：“……在前進的道路上能得到一點點同情也是好事，但一個勇士當了解人家只不过是向他布施一點溫暖，他是不能忍受的。”（“過客說明詞”）。克里布索娃的解釋是：“為了達到目的地，他不能讓任何東西束縛住……”（“魯迅和他的野草”）還有右派分子馮雪峯的解釋是“……因為太多的好意的贈與，對他是過重的負擔，會使他不能走遠路。”（“論野草”）但這些都不一定就接觸到了魯迅先生的本意。我以為在“兩地書”第一集中23信及24信里面有些話可以幫助我們對這情況的理解。自然這必須結合魯迅先生寫“過客”時那個可詛咒的時代來看的。在第23信中許廣平先生有這樣的話：“……凡有死的與我有關的，同時我就憎恨所有與我無關的活着的人。”在第24信中魯迅先生對許廣平先生的話提出自己的看法。魯迅先生說：“而我正相反，同我有關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這意思也在‘過客’中說過，都與小鬼不同。”這裡包含看沉痛的悲哀和憤慨，因愛之深，反而

咒詛她的灭亡，正是与旧社会的黑暗势力誓不并存的表現。接下去，过客說那片布如果背在袋子里就不好走路，这也是憤激之言：魯迅先生在这段时期里也是一直向前冲击的。但由于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却时时感到悲觀，絕望。然而，现实社会斗争的发展和他与进步青年及劳动人民的接触，又每每給他以希望，使他重新考虑对人生观察的偏頗。所謂使他不好走路，乃是发見了他的旧看法，他的成見有了破綻，并非真的不好走。魯迅先生在“热风”的“无題”中有一段深刻有力的自白，就是当有一次一个小店員向他表示后悔，表示慚愧的时候，他“也慚愧了”，于是写道：“这种慚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損的。”但这是真的有損嗎？不，就在下文中写出他正面的意見：不是有損，而是“渐渐覺得我的周圍，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热风”，“无題”）

“翁——那么，再見了。……”“客——多謝你們。……我只得走……”这里写过客是繼續前進了。他将穿越墳墓，战胜死亡；而且此后的途中所見也将不是“我就只是一个人”。